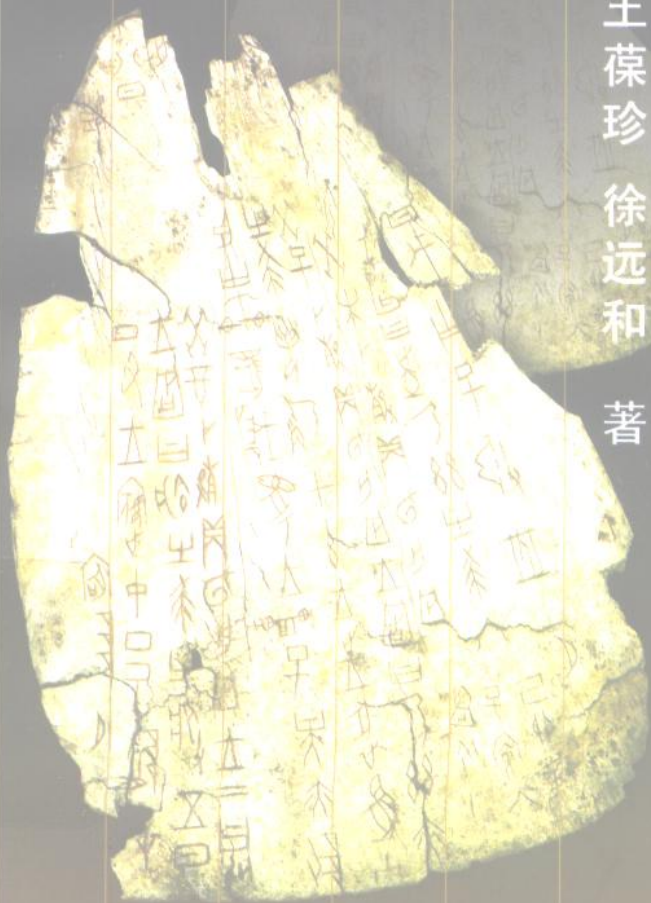


中华文明观

王葆珍 徐远和 著



東方出版社

中华

王葆珍 徐远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

开观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夏 青

装帧设计:刘林林

版式设计:赵迎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文明观/王葆珍、徐远和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6

ISBN 7-5060-1075-5

I. 中...

Ⅰ. ①王... ②徐...

Ⅱ. 文化史-中国

Ⅳ. R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9766 号

中华文明观

ZHONGHUA WENMING GUAN

王葆珍 徐远和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6.125

字数:118 千字 印数:1—4,000 册

ISBN 7-5060-1075-5/B·176 定价:10.00 元

目 录

绪 论

一 中华文明与中华文明观	(3)
(一)文明的涵义和标志	(3)
(二)中华文明的特征	(7)
(三)中华文明观的内涵	(12)
二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18)
(一)人类亚洲起源说	(19)
(二)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模式	(20)
新石器文化:文明因素的孕育	(21)
龙山时代:中华文明的诞生	(25)
(三)璀璨的中华古典文明	(29)
青铜器文化:成熟的中华文明	(29)
殷墟文化:高度发达的古典文明	(32)

上篇 古代文明观

三 农业文明观	(39)
---------------	------

DI96/18

(一)重农思想	(39)
(二)井田制理想	(46)
四 生态文明观	(53)
(一)天人合一	(53)
(二)生态平衡	(58)
(三)环境伦理	(62)
五 科技文明观	(66)
(一)理具法中	(66)
(二)鄙视“奇技淫巧”	(70)
六 礼乐文明观	(75)
(一)制度在礼	(75)
(二)修养纲目	(81)
(三)揖让而治	(86)

下篇 近现代文明观

七 工业文明观	(93)
(一)工业兴国	(93)
以夷为师	(94)
振兴实业	(100)
(二)畅遂民生	(105)
八 科学与民主观	(111)
(一)科学	(111)
(二)民主	(119)
九 中西文明观	(123)

(一)中体西用.....	(123)
(二)全盘西化.....	(128)
(三)文化救亡.....	(134)
十 现代文明观.....	(140)
(一)现代化.....	(140)
(二)可持续发展.....	(150)
人口 资源 环境	(150)
跨世纪发展战略	(153)
(三)文化创新.....	(155)
(四)精神文明.....	(159)
理想 信念	(160)
科教兴国	(162)
结束语 推进社会主义整体文明建设.....	(164)
(一)两个文明协调发展.....	(164)
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整体文明发展观	(165)
建构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道德体系	(168)
重视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文价值追求	(175)
(二)提高现代人的素质.....	(177)
人的素质:社会文明的标尺	(178)
现代人素质的基本特征	(180)
现代人素质的养成	(185)
后 记.....	(188)

绪 论

一 中华文明与中华文明观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这种古老的文明，我们称之为中华文明。

那么，什么是文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是什么？中华文明又具有哪些特征？中国历史上有些什么样的文明观？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一）文明的涵义和标志

“文明”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见于《易·文言传》：“天下文明”；《尚书·舜典》：“濬哲文明。”据考证，今本《舜典篇》，乃东晋孔传本从《尧典》中分出。据近人考订，《舜典》开始的28字（其中包括“濬哲文明”四字），实为南齐建

武四年(公元 487 年)姚方兴奏献本所附加^①。因此,《舜典篇》的“文明”二字,较之《易·文言传》的时代为晚。关于《文言传》的年代,一般认为,应是西汉初期的著作。汉字“文”与“明”二字连缀一起构成一个词组,恐不能上溯到先秦时代^②。在古代汉语中,“文明”一词的涵义,据孔颖达解释:“经纬天地曰文,照耀四方曰明。”^③ 所谓文明,就是摆脱愚昧、走向先进的意思。

现代汉语中用“文明”翻译西文 civilization 一词,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lis”(城市)。它的定义,就如同“文化”(culture)一词一样,有着许许多多,迄无共识。一般认为,欧洲在 18 世纪才将这个术语用于正式文献中,直至本世纪中叶才广泛运用于人文科学各领域。大体说来,在 20 世纪以前,这个术语通常是指阶级社会出现以后的整个人类历史,而与以前的“野蛮”社会(即原始社会)相对立。20 世纪初开始,这个术语就不仅用于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方面,而且用于空间方面,即用以表明“地域性文明”。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曾将“野蛮”分为“蒙昧”与“野蛮”两个时期,并与“文明”时期合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时期。他又把蒙昧时代分成三个阶段:低级阶段是从动物变成人的过渡时期,可以说是人类的童年。这时,人类住

① 参见《十三经注疏》本《舜典篇》孔颖达疏及陈梦家《尚书通论》第 71—72 页、112 页。

②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1 页。

③ 《十三经注疏》。

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一部分在树上，以果实、根茎为食物。到了中级阶段，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所提高，能捕捞鱼类作为食物并开始使用火。随后，人类发明了弓箭，而进入高级阶段。恩格斯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①

野蛮时代初期，人类开始学会了制陶术。野蛮时代的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人类开始冶炼铁矿，创造了文字。人类从野蛮时期的高级阶段经过发明文字和利用文字记载语言创作而进入文明时期。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经引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摩尔根的研究，人类由原始状态进入文明时代有四大标志：第一，在生产方面，人类学会了对天然产物的加工。第二，在社会关系方面，由于分工、交换和商品生产较充分的发展，人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第三，在政治方面，产生了国家和一定的法权制度。第四，在精神生产方面，精神文化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总之，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创造出了自己的历史。

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以指称一个社会已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在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农业、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个别文明如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纪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在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欧洲的远古文化只有爱琴—米诺文化,可以称为“文明”,因为它已有了文字。此外,欧洲各地的各种史前文化,虽然有的已进入青铜时代,甚至进入铁器时代,但都不称为“文明”。^①

在这里,还要捎带提一下“文化”概念。“文化”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概念,是指人们精神生产的成果;广义的“文化”概念,是指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即不仅包括精神方面的,而且包括物质生产、经济结构、社会组织、典章制度和语言文字等方面。因而,理解为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的“文明”概念,从内容上说,也就是指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方式及其一切成果的总和。

我们对“文明”的理解,基本上采取目前国际学术界比较流行的看法,即把“文明”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更具体地说,是指占有一定空间的(即地域性的)社会历史组合体。

基于对“文明”的上述理解,我们在本书中将力求阐明

^①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81页。

中华文明和中华文明观。

(二) 中华文明的特征

中华文明灿烂辉煌。它有 5000 年的悠久历史,是世界
上唯一未曾中断过的古老文明。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
我们拟设专章加以论述(见本书第二章)。这里,先对中华文
明的一些重要特征予以说明。

第一,“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模式。早先,人们一般都
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因此而有“黄河——中华
民族的摇篮”、“黄河——祖国的母亲”之类的说法。现在看
来,这类说法固然没有错,但是并不全面。因为,中华文明的
起源并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我国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
现,证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限于黄河流域,而包括其他若
干区域。大致说来,中华文明的摇篮可以分为四个区域:一
是北方文化区,在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已发现有比较发达
的原始文化遗址,如东山嘴遗迹,布局严整,有成组立石和
陶型人像群,显然是远古时代的祭坛。近年,辽西发现了
5000 年前属于红山文化的大型积石冢,它的墓葬体制宏
伟,区分等级,随葬的玉器数量众多,而且精美。这似乎意味
着基于氏族公社而凌驾于氏族之上的高一级社会组织正在
形成,从而接近了文明的门槛。二是黄河流域文化区,距今
4000—5000 年以前或更早,其文化遗迹,极为丰富,包括仰
韶文化、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大汶口文化一

龙山文化,等等,已经进入文明时期。三是长江流域文化区,如江汉流域的屈家岭文化,源远流长;太湖区域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也是我国重要的古文化中心之一,大约距今5000年前已经进入文明时期。四是珠江流域文化区,先后出土了一批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其中,鼎湖山麓首见屈肢葬,证明这里曾是距今4000—5000年前原始社会晚期的文化遗址,孕育着文明因素。总之,考古学研究的成果确立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模式。

第二,“协和万邦”的社会整体文明。《尚书·尧典》在称赞帝尧的功德时曾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意思是说,尧能弘扬伟大的道德,使远近亲族都能和睦友好,相亲相爱;使天下诸侯能和平共处,协调一致;使黎民百姓能改恶从善,风俗和美。透过这些赞美的言词,可以看出,我国古人所崇尚的是一种人性善良、道德淳朴、万邦协和、国泰民安的文明社会。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夏、商、周三代,诸侯邦国林立,“亲睦九族”、“协和万邦”实乃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首要前提。所以,自三代伊始,统治者就逐步建立并完善了血缘宗法制度。秦汉以后,我国又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形成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与之相应,在宗法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一种人伦型群体网络结构,笼罩于全社会之上。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早在西周初年,周公就以“制礼作乐”作为治国的两大政治措施。由于礼乐具有管理国家的功能,因而被历代统治者运用于治国的政治实践。所谓

“制度在礼”^①，反映了礼乐作为古代的文物典章制度，包括政治上的纪纲法度和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范，是中国古代社会协调发展的制度性保障。在我国古代，礼乐被制度化、法典化、神圣化，形成一套完备的礼乐文化系统，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规范政治制度，强化道德教育，协调社会运行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华古代文明，实际是一种礼乐文明。可以说，中华文化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对社会整体文明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第三，“濬哲文明”的人文理性精神。《尚书·舜典》曾称赞帝舜具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的品德。据宋人蔡沈解释，这是指帝舜具有“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诚信而笃实”四种“幽潜之德”^②。以现代人的眼光看，在帝舜的思想品德中，充溢着人文精神。而且，这种人文精神是融摄着理性精神在内的。因为，所谓“濬哲”，就是深沉的智慧。这种深沉的智慧是理性的表现。中华古典文化，从一开始就既充溢人文精神，又涵具理性。众所周知，儒家创始人孔子是特别重视人文精神的。孔子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③，对未脱离自然状态的鸟兽与超越自然而结成一定社会联系的人群作了区分，体现了崇尚人类社会文明的思想。同时，孔子又提倡仁智并重，反

① 《礼记·仲尼燕居》。

② 蔡沈：《书经集传·书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③ 《论语·微子》。

对“不知而作”^①，这意味着重视人文精神的孔子同样具有理性精神。应该说，在孔子的思想中，人文与理性是统一的。这种人文与理性统一的精神，我们称之为人文理性精神。它是中华文化特有的品格，中华文化的特质。正是因为具有这种特质，5000年的中华文明才更显灿烂辉煌，多姿多彩。远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中华大地就出现了第一个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繁荣时期。依据考古发现，诸如玉石器的制作，动植物的驯养栽培，骨耜陶器的发明，住宅的建造，乃至人工烧制混凝土等建筑材料，养蚕和蚕丝织造技术等等，都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又据史籍记载，史前时代的先民有一系列发明创造，如：“伏羲制以徧皮嫁娶之礼”，“神农和药济人”，“蚩尤以金作兵器”，“黄帝见百物始穿井”，“羲和占日”，“常仪占月”，“隶首作算数”，“苍颉作书”，“史皇作图”，“胡曹作衣”，“雍父作舂杵臼”，“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马”，“共鼓、货狄作舟”，“女娲作笙簧”，“巫彭作医”，“祝融作市”，“垂作规矩准绳”，“咎繇作耒耜”，等等。^②这些记载与考古发现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业已萌发中华科技之光。中华科技文明持续发展，在天文学、农学、医学、建筑学、算学、化学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直至15世纪，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在16世纪以后，随着西方近代科技的产生和快速发展，中华科技才逐渐

① 《论语·述而》。

② 《世本·作篇》。

趋于落后。不过,人们有理由相信,智慧而又善于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创造出较之人类已有的一切文明更加灿烂辉煌的崭新的中华文明。

第四,“万物一体”的整体思维方式。古代中华文明与其特有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古代哲人善于将世界上的事物联系起来作统一的思考,形成一种“万物一体”的有机整体思维方式。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持“万物一体”说。此说滥觞于庄子。战国时代的庄子从相对主义的立场出发,竭力否认和抹杀事物之间的差别,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①,客观上宣扬了一种“万物一体”的整体系统观念。东晋佛学家僧肇进一步提出:“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②“万物一体”的整体系统观念更加明确。如果说,道家和佛家侧重于从自然与人的角度讲“万物一体”的话,那么,儒家则侧重于从社会与人的角度讲“万物一体”。儒家的“同群”观念,更多地体现着社会整体思想。宋代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③这种“民胞物与”的观点,显然也是一种社会整体思想。明代王守仁更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屡屡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

① 《庄子·齐物论》。

② 《肇论·涅槃无名论》。

③ 《正蒙·乾称篇》。

④ 《传习录》中。